

当代人幸福感危机的辩证反思

张怡

(西北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3)

摘要:针对当代人实现幸福的危机和问题,分析了幸福感危机产生的理论原因和社会原因。分析认为,人类幸福观的多样性、幸福问题本身蕴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幸福自身内在的要素与结构的多元性以及社会发展、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观念与模式导致当代人幸福感危机的加剧。分析结果表明,为了走出幸福感危机之困境,至少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珍惜生命的内在价值、正当节欲、融洽群己关系。

关键词:幸福观;幸福感危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内在价值;节欲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4)03-0116-06

幸福是人类自古以来追求的永恒主题之一,实现人的幸福更是现代化运动的根本目标和内在动力。近代以来,直线性进步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曾经为人们勾绘了一幅幅由技术进步、科学、民主等现代性价值为根基的幸福愿景。然而,由西方主导的人类文明的现代化叙事至今非但未能兑现其理论承诺,给人们带来预期的幸福感,反而给当代人的幸福实现带来一系列问题:生活负累沉重、工作压力巨大、生态环境恶劣、人际关系紧张、安全感整体性缺失以及精神迷失、信仰空缺等等,^①从而导致幸福感危机日益加剧。这就使幸福问题再次成为理论界热点。本文基于国内外人学、幸福学等对相关问题的研究,面对当代人生命存在的现实状况与遭际,拟探究幸福感危机产生的多层次原因,并力求探寻缓解甚至矫治之道。

一、幸福感危机的理论原因

幸福问题是关乎个体生命的人生体验和人生价值之实现的重要问题,而且幸福观连同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一起,对每个人的成长道路和奋斗方向有着非常重要的导引和推动意义。同时,一个群体、民族或国家的主导性幸福观或广大民众的幸福观状况还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利益和秩序。因此,对当代人的幸福感危机应该给予高度重视。笔者以为,究其理论原因而言,当代人幸福感危机的产生与加深大致有以下诸方面因素。

(一) 人类幸福观的多样性和迷惘性

幸福是个歧义性很强的概念,这使它表现出很大的相对性,即在不同时期、不同的人对幸福总是有着不同理解和感受。所以在思想史上,幸福成了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概念。据傅立叶说,单是罗马尼禄时代就有 278 种关于幸福的互相矛盾的定义^[1],以致于康德也慨叹其不确定性:“幸福的概念是如此的模糊,以致虽然人人都在想得到它,但是,

^① 由社会治安混乱导致的生存安全、商业行为不规范导致的消费安全、食品卫生与质量失控导致的食物安全、医疗卫生行业规范失范与医生不守医德而导致的医疗安全、道德迷失导致的信用安全、官僚腐败导致的正义安全、媒体低俗炒作导致的品味安全、环境污染导致的生态安全等等,使当代人处于严重的整体性安全感危机之中。

收稿日期:2014-04-15

作者简介:张怡(1979-),女,陕西凤县人,讲师。

却谁也不能对自己所决意追求或选择的东西,说的清楚明白、条理一贯。”^[2]

就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流派的幸福观来看,可谓各呈异说。儒家提倡德性主义幸福观。他们认为,在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人生历程中,个体应当以内在的修身养性,成就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并由此外扩而务大业、广业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中庸之道实现天人和諧、群己和睦、神形平和的圆融完满人生,这才是幸福的人生。道家崇尚自然主义幸福观。道家以为真正的幸福在于过一种清静无为、顺应自然而远离尘世喧嚣的原始质朴、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佛家则倡导禁欲主义幸福观。他们通过苦、集、灭、道四圣谛揭示人生此世本无幸福,唯有根源于“贪”、“嗔”、“痴”和“无明”的生老病死等种种无量痛苦,而只有修行念佛以灭除贪爱欲望,才能摆脱痛苦的“生死轮回”,并达到幸福的彼岸即“涅槃”。所以,佛家与其说是教人彻悟幸福根源和获得幸福的理论与方法,不如说是一种说明人生痛苦根源和摆脱痛苦的理论与方法。

西方文化对幸福的理解更是众说纷纭。西方思想史上的主流传统理性主义幸福观强调理性而贬低感性与情感的价值,从而主张抑制欲望以追求道德完善和精神上的幸福。他们认为人生目的和幸福在于按理性命令行事,而感官的享受和快乐只会玷污理性、荒废人生。这一传统在古代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斯葛特学派等为代表,而其中又有两种取向。一种是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为代表的德性主义幸福观。他们认为幸福就是自我完善、自我实现、自我成就,是自我潜能的完满实现。沿着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知识即美德、美德即幸福、理性即幸福”的理念,亚里士多德主张用理智指导生活才是最高的幸福:“神的活动,那最高的至福,也许只能是思辨活动,而与此同类的人的活动,也就是最大的幸福。”^[3]亚里士多德把美德视为幸福,他说:“行为所能达到的全部善的顶点又是什么呢?几乎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是幸福;不论是一般大众,还是个别出人头地的人物都说:善的生活,好的行为就是幸福。”^[3]柏拉图也认为:“一个有德性的灵魂是幸福的。”另一种是以犬儒学派和斯多葛学派为代表的禁欲主义幸福观。犬儒学派特别是其早期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为坚持以自制、自足、自主为美德的原则而反对享乐,为此他们拒绝过优裕的物质生活,主张要过像狗一样简单、贫穷、自由的生活。其鼻祖安提斯泰尼将苏格拉底在追求道德的

善时对感性东西的批判态度片面加以发展而走向禁欲主义,并认为要得到善就应抛弃人们生活中的各种现实享受和快乐,他一再说:“我宁可成为疯子也不追求感官的快乐。”^[4]其重要代表人物第欧根尼用自己一整套“第欧根尼大桶”式的生活实践和生命存在方式来宣传和诠释这种幸福观。斯多葛派则接受了犬儒派的精神,把顺从自然、绝弃情欲作为人们追求幸福的最高目标。

这种禁欲主义幸福观在中世纪被基督教神学家进一步发展为神学幸福观。神学家认为,人类实现幸福的途径不是通过对财富、名誉、权力和肉欲的追求与享受,而是在于热爱、信仰上帝的宗教修行中。尘世中的人只有对上帝沉思、崇拜,才能返归天国以获得真正的幸福。所以神学家把尘世生活视为趋向上帝天国的旅途,而修行是达到幸福的手段。托马斯就持这种客观目的论的神学幸福观。他把幸福分为完满的幸福和不完满的幸福。前者在于人依靠神的恩典及其带来的神学德性,由沉思活动洞见并通达彼岸的神性本质;后者则首先且主要于沉思中获得,也可能于人的行为和感情的实践理智活动中实现。托马斯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一样强调人性的自我完善,但他所谓的完善非人力所及,必须依赖神助。在他看来,现世的幸福只是不完满的幸福,不管怎样吸引人,相对于天国完满的幸福来说总是不足道的。由此一来,现世只是旅程,来世才是目的。当然,尘世的幸福生活对于天堂的幸福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前者毕竟还是后者的前提。因此,只有在修道院中摆脱尘世的诱惑和纷扰,达到圣洁状态,才能获得幸福。

理性主义传统幸福观到近代以降则以笛卡儿、斯宾诺莎、黑格尔等人为代表。斯宾诺莎哲学的根本出发点在于求得人生的幸福,其目的便在于获得最高的幸福。所谓最高的幸福,是人通过理智而“一经发现和获得之后,我便可以连续地永远享受无上的快乐”。斯宾诺莎认为,人“对神的理智的爱”和神对人的爱乃是相通的,这种爱与爱的融合便汇成了爱的洪流,人在此洪流中超越了个体的存在,而得到了永恒的最高幸福。当然,这里的神即自然,神的力量就是自然的力量,神的指令就是自然的法则和规律。斯宾诺莎所说的真正的幸福是最高的善,是一种精神幸福,这使他对世俗幸福所包含的物质利益极度鄙视。而哲学的真正目的就在于培养高尚的道德品格,使人心臻于至善以达到最高圆满的境界,甚至要“使一切科学皆集中于一个最终目的。

这就是要达到……人的最高的完善境界”^[5]。后来的包尔生也表达了这一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幸福是人们一心渴望的人生境界的实现,是追求终极目的的过程,是人生价值得到肯定时的满足感,是创造力得以实现而获得的一种心理体验。包尔生将幸福定义为:“是指我们存在的完善和生命的完美运动。”^[6]黑格尔认为,作为以理性为本质的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他反对把对幸福的理解停留在用以满足生物性需求的物质福利上,而且不能把人追求幸福的权利绝对化,追求幸福应以理性和善作为限制。

此外,从古希腊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的自然主义到近代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甚至理性主义者(如康德等一脉)则形成感性主义幸福观。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幸福论认为,幸福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7]。这是把精神的安宁、心理的健康和愉悦看作幸福的要素。穆勒、休谟、霍布斯认为幸福就是快乐。霍尔巴赫就说:“天生幸福的人,就是从自然接受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活动灵敏的器官、一种正确的精神,和一颗其情欲与欲求都和命运曾把我们置于其中的环境相类似和相适合的心。”^[8]洛克说:“充其量的幸福就是我们所能享受到的最大的快乐;充其量的苦难就是我们所能遭受的最大的痛苦。”^[9]弗洛姆也持同类观点,他把愉快与幸福等同,二者唯一的差别在于前者指的是单一的活动所带来的喜悦,而后者是全部的与连续的愉快感受。通过这类幸福观很容易得出以下理解:既然快乐对于需要得到满足的心理体验,那么幸福就是快乐,意味着幸福是一种主观的心理体验,而一个人只要主观上觉得幸福他便已经幸福。其实,快乐的心理体验不过是幸福这一客观本性的必然的主观显现和伴随物。康德承认人的生命存在的二重性。他将人看作既是以道德原则为活动准则的理性世界存在者,又是以幸福原则为活动准则的感性世界成员,并服从欲望和爱好的自然规律,其感性欲求的满足也是人的一种本质性存在。因此,“获得幸福必然是每个有理性但却有限的存在者的要求,因而也是他的欲求能力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规定根据。”^[10]这样,康德就把幸福建立在纯经验的基础上,而一个人的幸福也是由他当下的感觉所决定。幸福成了愉快的感觉、感官的快乐。这完全是将幸福等视为主观内在的幸福感,即一个人如果意识到自己是愉快的,那么他就是幸福的。因为感性世界里有着不同个性追求的人,不可能找到幸福的统一

范本,所以这种感性主义的幸福观必然潜藏着相对主义,使幸福没有统一的标准。随着心理学的不断社会化,后现代人文学者基于传统理性主义幸福观抹杀了个人意志的批判立场,更强调幸福是一种自我化、个人化而且视觉化、听觉化的感觉享受,它不是物品也不是文化,而是一种流动在任何一个生命里的能量。“后现代哲学在幸福问题上归根结底只是将传统的‘统一性’德性,变成了‘自我’心中规定的德性。”^[11]而在对传统理性主义德性幸福观和信仰主义神学幸福观解构之后,使后现代幸福观沿着感觉主义路线走得更远,将多元化与虚无化的特征推向极致而难免导致幸福感的迷惘和碎落。

以这些多样化理论去指导充满不幸、忧虑、烦恼的人生,反而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在多元化中失去方向,从而莫衷一是的幸福理论并没有使人真正得到幸福,甚至有的人对幸福问题越加感到迷茫、痛苦。

(二) 幸福问题本身蕴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

1. 幸福的理论同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

研究幸福的人未必生活得幸福。古今中外有多少哲学家、思想家毕生探究幸福真谛,却又有几人真正获得自己所追求的幸福呢?以“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能够使人唱着动听的歌曲离开人间”而著称的伊壁鸠鲁,在结石症的剧烈疼痛中却长一声短一声地呻吟着向死神走去,他的快乐主义幸福观与其个人生命的现实体验之间显然有着距离。感性主义者通常把幸福定义为“欲望的满足”,然而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当代人更加不幸福。无限的欲望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满足,使“幸福”日益变得飘忽不定。人们更多地感受到痛苦与不幸。作为一种心理期待,人们在幸福的追求中有着无尽的“真实的期待”、“完整的期待”、“健康的期待”、“真知的期待”等等^[1],但由于自身、自然、他人、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往往在现实中可能是痛苦、不幸、毁灭。

2. 在实现幸福问题上有着群己之间的矛盾

群己之间的矛盾即个体幸福与他人、社会追求幸福之间的矛盾。围绕着欲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个人的满足还是全社会的满足,即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这一问题,人们展开不断的论争。洛克提出以人的本性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幸福论,与此相对,培根提出“全体福利说”,认为那种缺乏社会之爱的孤独之人没有幸福可言。费尔巴哈也主张建立在人的自然本质上的所谓“同志式的共同幸福”或“完全的合理利己主义”的幸福论。即使二者同时实现,也必

然会出现个人追求幸福的有目的性、有计划性和整个群体、社会乃至人类范围对幸福追求的无计划性、多向性之间的紧张与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和实现。此外,在幸福的不同类型之间往往难以统一,诸如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过程幸福与结果幸福等等。而这些矛盾、冲突在当代可能激化、尖锐,就会消弱人们的幸福感。

(三) 幸福自身内在的要素与结构具有多元性

早在《尚书·洪范》中,箕子提出九畴时以“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之说谈到幸福的5种要素:长寿、富足、康宁平安、爱好美德和善终正寝。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梭伦也指出要实现幸福,就必须具备以下诸要素:有中等财富、身体不残疾而无疾病、人生顺利且心情舒畅、有满意的子孙和能善终并安乐而死。可见,从要素或内容来讲,作为人的需要之满足,幸福感具有多元性、立体性和整全性的特征。同时,幸福是主观需求和客观条件的统一体。主观性是幸福所具有的极度快乐心理体验本性,客观性则是人的需求之满足和生存、发展之条件性与规律性。只有幸福的主观形式与客观内容相一致时,幸福才具有真实性。而当代人在泛商品主义潮流中不断走向极端化、片面化、平面化,具体表现为经济主义发展观、消费主义生活观、感性主义幸福观、物质主义人生观和原子主义伦理观等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这种单向度的价值追求和生命存在形态势必违背或打破幸福本身的多元性、立体性和整全性,使人的幸福感一再陷入危机的泥淖。

二、幸福感危机的社会原因

从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当代人幸福感危机之所以加深,还在于有关社会发展、社会生活、人与人以及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理念与模式。

(一) 经济主义发展观及其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蕴藏了幸福感危机

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运动的推进中已有了空前、飞速发展,尤其是经济一直在增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甚至经济活动愈来愈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和交往活动的焦点与基本途径。而经济进步的功绩和作用所凸显的价值,使微观领域的个体、中观领域的国家和宏观领域的国际等多层次主体都逐渐

把人类历史的发展或人生价值的提升归结于经济方面的增长,从而形成经济主义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然而,在这种令人骄傲的进步中,人们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幸福伴随着物质增长而增长,人们也常常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幸福,甚至很多人认为自己是不幸福的。这表明财富的多少与幸福指数的高低并不挂钩。正如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所揭示的那样:“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其中美国居第一,古巴接近美国,居第二。”^[12] 财富的增加固然是影响人们幸福和快乐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当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财富增加开始相对而不是绝对地影响人们的幸福水平,甚至财富的增加意味着工作节奏过快和压力增大,使人越来越忙碌,并面对更多的紧张和压力。同时,经济一元化势必造成对人生其他价值和幸福体验方式与层次的遮蔽或侵占。

(二) 社会整体就业危机压迫着人们的幸福体验

随着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在全球范围的不断扩张与深化,人们的就业压力日益加大。据统计,在中国每年不仅要解决逐年递增的博士生、硕士生和350万~400多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而且还有500万以上下岗职工、大量的转业军人和干部需要安置;每年有2000万新增劳动力从农村1.5亿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这样一来,由于就业压力过大而致岗位、收入无以保障的情况下,人们的幸福感危机不断加重。

(三) 日趋严重的整体性安全危机冲淡了人们的幸福感

安全感作为一种心理体验,它虽然不同于幸福感,但是安全感是幸福感中重要的一部分,即没有安全感就别想要幸福。然而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由社会治安混乱导致的生存安全、商业行为不规范导致的消费安全、食品卫生与质量失控导致的食物安全、医疗卫生行规失范与医生医德不守而导致的医疗安全、道德迷失导致的信用安全、官僚腐败导致的正义安全、媒体的低俗炒作导致的品味安全、环境污染导致的生态安全等等,使当代人处于整体性安全感危机之中。特别是社会治安导致的安全感严重影响着人们幸福指数的高低。据相关调查显示,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直到2003年以前,中国公众社会治安的安全感一直呈下降态势,2003年后大幅回升,

但是2004年开始呈现下降局势。环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当代人的高物质、高能量消耗排放大量的废弃物,引发空气、水源、土壤、动植物的污染,使自然净化能力下降、再生能力衰减,这些环境危机、气候危机等全球问题表征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同样加深了人们幸福感危机。

(四) 原子主义的伦理观和社会生活模式消解着当代人的幸福感

“人生在世”、“人活一世”这两个命题恰恰揭示了人类生命存在历程中要处理的最基本关系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由这一关系又可以进一步分化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等四大关系。无论从最基本关系还是四大关系来讲,每个人的生命存在及其人生历程和文化活动都不是在个体的孤立状态中展开的,而是要与他人以及社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通过这些联系得以自我定位、社会定位和实现人生价值。所以,马克思揭示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相应地,人的幸福也必然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而一旦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处理不当,就会使人感到压抑、痛苦而失去幸福。可是在原子主义伦理观导引的当代社会生活中,人类逐渐坠入疏离的冰窟,出现了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社会的疏离、人与人的疏离以及人与自我心灵的疏离。在这种原子式生存形态中,孤独、冷漠和寂苦也会吞噬着当代人的幸福感。

三、走出幸福感危机的正途

既然现实世界的人以幸福为最高价值,那么就应当克服重重危机,遵循幸福的客观本性和人类生命存在的本质,以探求实现幸福的正途。至少我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 珍惜生命的内在价值是实现幸福的前提

生命与幸福之间存在着不可或缺的内在联系,离开任何一方都会产生片面认识。生命存在本身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而且还是人类从事所有文化活动的前提和创造其他一切价值、体验人生意义并实现幸福的载体。因此,不管人们以何种方式为生存和幸福而奋斗,要把保养生命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就生命价值对其他价值的基础性而言,人活着本身就是幸福,即使活着不是幸福的全部。这

就要求向往幸福的人必须正视生命,对自己要有正确的人生定位,综合、辩证地把握人生历程中生命的过程性与多样性及其给幸福实现带来的复杂性。

(二) 正当节欲以协调人生命存在的二重性

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物质实体,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不仅追求肉体快乐,还追求精神的快乐。人的生命存在许多内在张力,并充斥着生命的全过程,其中最基本的就是生物性或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纠结。而人类生存世界的二重化也正源于人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动之二重性。“人的生命是由生理机体和精神活动两者结合而成的。一个正常的人,不仅要有‘生理的自我’,还要有‘精神的自我’,两方面都活泼健全才算完整的人。”^[13]“生理的自我”不过是类同它物的现实物质性存在,而“精神的自我”或“神圣的体现”则是富有创造力、能从事社会实践而灵长于万物的精神超越性存在。就前者而言,仅有物质世界便足以保证人类物质生命的存在和延续,但这并不能保证人的全部幸福;从后者来讲,人必须超越物质世界,构筑自为的意义世界,即拓展其精神空间以实现人在物质世界未满足的精神需求,从而实现更高的幸福。这种人的生活世界注定二重化或多重化的事实要求人们必须协调神形或身心、物质需求与精神追求而实现圆满的幸福。为此,人应当淡化物质享受、超脱物质局限而追求生命精神价值,最终在“安身立命”之境实现精神自由和最大幸福。否则,物欲需求的无限性与满足方式和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不对称只会将人拖入不幸的渊藪。

(三) 群己融洽是幸福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这决定其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并由此标示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具有社会性。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个人之思想、情感、行为、需求等等都由社会制约并决定着。因此,人的需求与幸福都与他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任何个体对幸福的追求都不再是单纯的个人追求与享受,因为“当一个人专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14]。由此可见,幸福也具有社会性。所以,处理好群己关系并保持权利与义务对称、平衡是个体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

四、结 语

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直线性进步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一方面为人们勾绘了一幅幅由技术进步、科学、民主等现代性价值为根基的幸福愿景,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叙事的各种价值观念以及种种社会问题的合力效应下,给当代人实现幸福带来一系列问题,从而导致幸福感危机日益加剧。这种危机已经表现在人生情态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针对其表现,以探究和反思幸福危机为缘由,并以人类生命存在的本性及其终极价值和幸福真谛为依据,检视并矫治当代人生与社会生活的偏失、流弊,人类才有可能踏上能够真正抵达人生福地的正途。

参考文献:

[1] 王永年. 生命的张力:人类双重价值追求论略[M]. 福州:海风出版社,2002.
 [2] 周辅成.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集:下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3]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科伦理学[M]. 苗力田,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4] 杨适. 哲学的童年:西方哲学发展线索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5] 斯宾诺莎. 神、人及其幸福简论[M]. 洪汉鼎,孙祖培,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6] 包尔生. 伦理学体系[M]. 何怀宏,廖申白,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7]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古希腊罗马哲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8] 罗国杰,宋希仁. 西方伦理思想史:下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9] 苑立强. 理欲论[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10] 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 杨祖陶,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1] 马妮. 解构之后的多元与虚无:后现代幸福观简论[J]. 江海学刊,2010,52(4):224-228.
 [12] 梁捷. 幸福指数:中国人幸福吗[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
 [13] 牟钟鉴. 儒学价值的新探索[M]. 济南:齐鲁书社,2001.
 [1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Dialectical reflection of the happiness crisis in modern society

ZHANG Yi

(School of News and Dissemin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Xi'an 710063, Shaanxi,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risis and problems of happiness in the modern society, theoretical reason and social reason for its appearance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diversity and the problem about happiness contain insurmountable contradiction and the aggravation of happiness crisis, which is caused by the internal elements, the diversity of the structur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idea and philosophy about social activit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several aspects that shall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order to get out of the dilemma of the happiness crisis. These aspects are the cherishing of the intrinsic value of life, appropriate abstinence,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Key words: view of happiness; happiness crisis; western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intrinsic value; abstinence